

地方视野下的女性财产权益

□章宪法

枞阳会官是皖江地区的一个小镇，晚清著名文学家、教育家吴汝纶即出生于于此。吴汝纶的侄女吴芝瑛一度知名度更高：诗文、书法为慈禧太后赏识，吴芝瑛闻名京师；引导、资助秋瑾东渡日本，后又冒死为秋瑾收尸，成为当时海内外舆论的焦点。而吴芝瑛捐产助学案，则搅动安徽的政界、学界及民间，诸多总督、巡抚等要员介入其中，甚至令晚清新政也陷入了法律上的尴尬境地，从而轰动一时。

吴芝瑛出生于地方名门“高甸吴氏”，安徽桐城（今枞阳会官）人，其父亲吴宝三曾任山东郓城知县。吴宝三与妻吴张氏只育有一子一女，子吴宗保早夭，实际仅有一女吴芝瑛。吴宝三去世后，吴张氏于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立同族吴君昂之子吴超为嗣孙。不幸的是，次年七月吴超殁，吴张氏悲痛欲绝于次月病故。作为“独生女”，吴芝瑛回乡处理父母遗产。

吴芝瑛丈夫廉泉出自无锡名门，曾官至户部郎中，家资颇丰。作为知名的知识女性，吴芝瑛将父亲“所有田产除业经捐入祠堂及周给族中贫苦外”“所余住宅及唐钱庄戴庄田产各项，尽数捐建学堂”。吴芝瑛与供职度支部的堂弟、吴汝纶之子吴辟疆商讨此举，得到了吴辟疆的赞同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十二月，吴辟疆代吴芝瑛上书两江总督周馥，“恳求俯赐核准，立案代奏，以广劝兴学事”。

周馥为安徽至德（今东至）人，曾与吴汝纶同为李鸿章幕僚，且私交深厚。接到吴辟疆上书后，周馥“披览来牍，深堪嘉尚”，当即批转安徽巡抚恩铭，并叮嘱其“应准予立案，并亟为表彰，风示海内”。

得到了两江总督的肯定与支持，吴芝瑛愿望的实现应指日可待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高甸吴氏族人吴宝玉等，状告吴芝瑛擅捐父亲的遗产。桐城县令审理后



认为，吴芝瑛“以出嫁之女擅捐吴业，似不近情”，又鉴于吴宝三之嗣孙已夭折，提出让吴家先解决吴宝三的立嗣问题，然后才能处理遗产。安徽巡抚恩铭认同了桐城县的结论，并明示“不许翻案”，两江总督周馥的批文被束之高阁。

吴芝瑛捐产助学受挫，又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四月先后电禀两江总督周馥、安徽巡抚恩铭、安徽学务处冯煦等，还多方联络其他安徽籍官员，以期共同对桐城官方施压，支持自己捐产兴办新式学校，但始终未见任何改观。

在吴芝瑛捐产助学官司中，桐城县令敢与两江总督周馥等对抗，通常被解读为晚清官场的派系斗争，以及桐城地方宗族势力的强大，其实都不客观。学者白凯在《中国的女性与财产》中，系统考察并研究了960—1949年间中国女性财产权利变动，近千年中国家庭财产继承和妇女财产权利的演变，从法律层面厘清了妇女与财产继承的关系，尤其是从妇女史的视角，聚焦女儿、寡妇、妾等不同女性群体，观察有关妇女财产权利和财产继承的法律表达与实践。依白凯书中所述，类似吴芝瑛“女儿”身份的中国女

性，早在明代即从法律上失去了对父系遗产的继承权。

其实，吴芝瑛对大清律法并不陌生，在女性法定遗产继承权问题上，她始终不介入诉讼，而是不断寻求官方高层与皖籍官员的支持，并通过媒体对地方政权施压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《南洋官报》刊发《论桐城知县处置鞠隐学堂事》，公开批评桐城知县，声援吴芝瑛捐产助学义举。桐城官方十分被动，但处理诉讼又必须依据律法，地方官无权作出违背律法的判决。

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吴芝瑛捐产办学案，转机的出现有些偶然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安徽巡抚恩铭遇刺身亡，由主持学务的冯煦接任巡抚，桐城县令亦已换人，原有的僵局顿时打破。在晚清新政的大背景下，继任两江总督端方亦明确支持吴芝瑛。其次，吴芝瑛捐产助学的主张，得到了高甸吴氏族族长吴汝缙的支持。吴汝缙系湖南候补知县，也是当时开明的文人。吴汝缙一面压制家族内部的反对声音，一面奔走安徽学务处等，要求官方“照廉吴氏原禀办理”。“廉吴氏”，即廉泉夫人吴芝瑛。其三，吴君昂同意被立为吴宝三嗣子，并表示支持吴芝瑛的主张，将吴宝三的遗产用于兴办新学，这在律法层面上，解决了吴芝瑛捐产助学的最大难题。以吴宝三字命名的“鞠隐小学堂”（今枞阳鞠隐中学），最终得以创办。

吴芝瑛捐产办学案的圆满解决，并不意味着妇女获得继承权。女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享有和儿子一样的继承权，在二十余年后方得以实现。1929—1930年，史尚宽起草并参与编纂的《中华民国民法典》获得颁布，女儿平等继承权终于在法律层面上得以确立。饶有趣味的是，史尚宽与吴芝瑛都是安徽桐城人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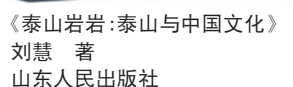
一座大山的使命

□藺时工

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泰山。尽管由于视野、角度、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不同，对于相同的风景，会产生迥异的认知，但每个人对于泰山的诚挚初心，数千年来却是始终如一的。刘慧新著《泰山岩岩：泰山与中国文化》（以下简称《泰山岩岩》）是一部集思想性、学术性、普及性于一体的著作，解读书，我们试图首先通过破题入手。

《诗经》曰：泰山岩岩，鲁邦所詹。耸立在《诗经》里的泰山，独具岩岩气象：把“岩岩”化身于泰山之雄，通过地理视野的辽阔，凸显泰山在齐鲁大地上举目可见的巍峨；把“岩岩”引申为“稳如泰山”的文化意象，是造物主利用地质之手，偶然存在于必然之中的杰作，象征江山亘古、国泰民安的意境豁然开朗；把“岩岩”诠释为浩然正气，将自然山岳的崇高与儒家推崇的道德境界相融合，凛然磅礴，万法归宗；把“岩岩”既指向泰山固有的自然属性，也喻示先民对泰山的原始崇拜，其“鲁邦所瞻”的视野既是地理的，也是精神的；把“岩岩”理解为泰山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其文化寻根、文化自信、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，进一步引领社会进步和发展，自是本书的应有之义。

泰山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，其二元特质构成极具东方智慧的哲学命题，在天地玄黄中演绎着独特的生命辩证法。所谓神圣，仰之弥高，源自其作为“泰山安则天下安”的民族理念。从文化角度追溯，两千五百多年前，先哲孔子践行大道，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，从此，泰山成为一座文化的大山。所谓谦卑，厚德载物，在于“泰山不与众山同”，和而不同的文化，最能体现泰山文化的吸纳性和包容性。不管儒、道、释以何种角色入主、做客，也不管是自我实现的道义担当，还是自我超越的心灵遨游……最终，泰山都使他们落地生根，各得其所，融汇贯通。



《泰山岩岩：泰山与中国文化》刘慧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

泰山的生命与尊严体现在人本精神的回归。大德曰生，生命至上，生生不息，生机勃勃，是一个民族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。体现在挑山工身上的负重登攀，是对生命的礼赞。而叶落归根，魂归泰山，作为一切灵魂最理想的归宿，则体现了人们对泰山的神圣向往。

泰山的艺术产生心灵共鸣。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共鸣。无论是山下的岱庙“秦即作峙，汉亦起官”，纳泰山须弥于芥子，为天下东岳庙祖庭；还是高山建筑的杰作岱顶碧霞祠，金碧辉煌，宝光笼罩；再次是刻石，镌书的历史，登泰山即是巡礼中国书法艺术的神圣。

本书著者刘慧是当今泰山研究的领军人物。他坦言，在耳鬓厮磨中蓦然回首，竟发现泰山是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。蓦然回首中的熟悉，如同云海日出、望人松、五岳独尊刻石、高山流水洞天，这是我们的耳熟能详。我们的动力来自于这些已知。而蓦然回首中的陌生，则如同高铁鸣笛与碧霞祠晨钟暮鼓共振时，所有熟悉的路标突然成为陌生星系的坐标。沿着这个坐标，发掘这些陌生，即发掘未知的富矿，发掘潜能，秉持传承创新。作为一个泰山人，越来越强烈地领悟到自己的使命：泰山文化需要更新的研究、更多的创新。研究的目的即在于创新。

登泰山一路拾级而上，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。直观的风景可以浏览，而文化则需要反刍、品评。网络时代的泰山，必然给旅游文化和旅游经济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泰山在人人心中。

要有光

□邱引

王十月沉淀多年，推出了长篇力作《不舍昼夜》，这部小说讲述了农村子弟王端午的一生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起，横跨四十多年，展现了每个年代的时代特点和人心人情，这部小说可称之为新世纪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王端午这个人物形象与孙少平有许多共同之处，他们都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苦苦奋斗，经历了种种苦难，只为心中不灭的火光。正如《不舍昼夜》的扉页上引用的《哈姆雷特》中的台词——“愿你忠于自我，不舍昼夜”，理想主义精神贯穿整部小说。很多人沉溺于物质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，但总有理想主义者始终遵循内心的召唤，犹如扑火的飞蛾，为理想燃尽一生。

《不舍昼夜》为当代文学贡献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，一个是王端午，另一个是冯素素。王端午生于贫穷的农村，小时候脑袋不灵光，却喜欢读书，在他以后的人生中，书籍无疑扮演了灯塔或者导师的角色。他读《卡门》《存在与虚无》《理想国》《荒原狼》《西西弗的神话》，这些名著深切地影响了王端午的精神，理想主义的火种在他心中生根发芽。不论是在贫穷的农村，还是在深圳打工的岁月，甚至是流浪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放弃读书。他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，也曾靠偷窃苟活，但正是书籍给予他的精神食粮，让他没有一味地沉沦下去。当他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后，能如苦行僧一样毅然放下一切，出去流浪，全靠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撑。当然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王端午经历了不少艰难选择的时刻，这时候



他往往与大脑中死去的弟弟对话，也就是他双重人格的体现。他的肉体要生存，难免会做一些违背道德准则的事，这时候他的另一重人格就会站出来，对他进行驳诘，让他遭受良心的审判。王端午的前妻冯素素也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，她一方面具有一个女作家的热烈感情，另一方面她又有冷静到可怕的理性。冯素素起初是以一个带点神经质的文学女青年的形象出现的，她在王端午身上看到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之火，这一点与她契合，因此，她嫁给了王端午。在当女作家和生孩子之间，她陷入艰难的抉择，最后她生命中的母性压制了理想主义精神。与王端午理想至上不同，冯素素为了生活放弃写作，专心打理书店，和王端午离婚后，她嫁给了一个教授。

从《不舍昼夜》中可以看出，王十月深受俄罗斯作家的影响，他笔下的王端午和《罪与罚》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及《复活》中的聂赫留朵夫都深陷

于罪孽之中，一生为了摆脱良心的责备，苦苦挣扎。王端午在小年夜偷了大学生李文艳的身份证和毕业证，并以此为捷径过上了衣食富足的生活。在内心中，他始终不能原谅自己的罪恶，当得知李文艳死后，他的良心更加备受煎熬。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之所以不过时，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伟大作品直面人生的罪恶，在道德两难中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物。

除了秉承现实主义的优秀写作传统，王十月也采用了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，王端午具有双重人格，在人生的很多阶段，他与头脑中的另一个“我”直接对话，这种写作方式丰富了人物思想内涵，使王端午这个人物更加立体化。此外，王十月在这部小说中还采用了非虚构的写作手法，《不舍昼夜》中的很多事件都有确切的时间，许多地点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确实存在的，大大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可信度，读来更有真情实感。

郁达夫曾说过，文学作品不过是作家的自叙传，《不舍昼夜》中的很多故事情节之所以逼真感人，与王十月本人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。没有亲身体验，王端午在深圳打工的故事，只靠想象是不可能写得这么入木三分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十月在《不舍昼夜》中，有大段的风景和民俗描写，这在当下的作家中已经很少见了，这种看似复古的写作方法为这部小说增彩不少。《不舍昼夜》以其精良的品质，精彩的人物刻画，必将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。

（作者为中学教师）